

清华新闻传播学 前沿讲座录

史安斌 主编

(第三辑)



清华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
新闻传播学

史安斌 主编

前沿讲座录

(第三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华新闻传播学前沿讲座录·第三辑 / 史安斌主编.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ISBN 978-7-302-45302-4

I. ①清… II. ①史… III. ①新闻学 - 传播学 IV. ①G21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3470 号

责任编辑：纪海虹

封面设计：傅瑞学

责任校对：王荣静

责任印制：沈 露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3mm×235mm 印 张：28 字 数：51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500

定 价：49.80 元

产品编号：072199-01

【主编介绍】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世界媒体峰会（WMS）全球新闻奖评委、中宣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和对外出版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首席专家、美国宾州大学比较文化和传播学博士（2001）。主要著作有《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理论·机制·实务》《全媒体时代的新闻发布与媒体关系管理》《全球传播与新闻教育的未来》（编著）、《国际传播前沿研究》（主编）、《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身份》（英文）、《全球新闻的流动与反向流动》（英文）、《人类传播理论》（译著），以及中英文论文近百篇（详见作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anbinshi>，新浪微博<http://weibo.com/shianbin>）。2003年以来作为主讲教授参与国务院新闻办主办的全国新闻发言人和全球传播高级研讨班，培训了中央和地方各级外宣干部、政府新闻发言人和国际新闻记者近万人。他还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的新闻评论员，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半岛电视台等多家中外媒体上接受采访或发表评论。

代前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柳斌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论述和工作部署，特别是在最近召开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结中外、沟通世界。”这短短 48 个字，概括了新形势下中国新闻舆论工作的总要求，是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体系的纲领，是推进新闻传播事业深化改革、融合发展的总指导。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新的时代条件”是个大势。以互联网、数字化和大数据为基础的传播技术革命，催生了社会信息化、新闻国际化和舆论大众化，以自由发表、民主讨论、平等对话、多向互动为特征的新媒体发展势不可当。这一变化，打破了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和新闻传播格局，也给中国现存的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实践和高等院校的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

要进一步提升主流思想、文化、舆论的引导能力，我认为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指导，从理论体系、实践模式、教育教材三大方面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贯穿始终，深化对新闻规律、传播规律、新媒体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传播技术进步、大众传播无所不在、社会舆论风云突变这样一些新特点，提出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实践性的新闻传播理论体系。

重构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

近百年来，中国新闻理论在引进、争论、比较、创新中发展，曾经经历过效法日本、照搬苏联、引进欧美、创新探索这样一些阶段，尚未形成主导中国新闻研究和教育的特色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复杂的传播格局和舆论生态，中国加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新闻理论的研究，编写了基本教材，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我们对新闻规律、全媒体时代全球化传播规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认识得还不深刻，科学的、系统的中国新闻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实际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认同度不高，不能适应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的现实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新闻院系的新闻理论研究、新闻教学中去，使新闻学真正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的要求，以及尊重规律、创新思维，用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传播中国新形象的论述，为重构和发展中国特色新闻理论体系指明了方向。

重构中国特色新闻实践模式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新闻实践丰富多彩，创造和积累了不少经验。诸如政治家办报、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深入基层、坚持新闻的真实性，等等。但是新媒体条件下的新闻传播，改变了固有的舆论生态和旧格局，8亿手机和“两微一端”成了新闻信息的重要阵地。面对这种情况，作为行业怎么办？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明了方向：一是，改革僵化的运行机制和单一媒体时代的体制，促进融合发展，打造多业态、多形态的新型主流媒体；二是，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的大势；三是，要以真实性求得公信力，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力，也是公信力的基石，媒体要准确报道，真实描述事实，把握和反映事物的全貌；四是，提高舆论监督水平，要直面我们工作、生产、生活中存在的真问题，揭露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五是，要面向公众、面向国际，创新话语体系，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文字、音像、形象讲党的主张、国家形象、中国的故事。这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专业技能、管理能力、引导水平的转变、创造和发展。

重构中国新闻教育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高等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传播工作者。我们应当彻底摆脱“解经释典”的经院主义、教条主义的新闻教育体系，彻底摆脱“技术至上”的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而要开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中国特色新闻学教育体系。我们培养的人才，应当是心中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定盘星”，手中有“十八般兵器”的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舆论的引导者、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和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按照中央批准的清华大学深化改革的方案要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经启动了新的改革发展历程，从教育、教学、教材三大方向，全面推进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从课程到教材、从教法到评价，都更加突出人的全面成长和发展，把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文化科学专业学习统一起来。巩固已经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面向主流、深入基层、新媒体传播和国际传播五大特色，依托清华大学多学科领先的优势，融合多学科形成新的交叉学科，开设面向未来的新的课程，以培养全媒体时代新闻、传播、文化、国际交流方面的高端人才。

目 录

代前言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 / 柳斌杰	001
-------------------------	-----

开篇

重思中国传播学 / 李彬	002
--------------	-----

学科前沿

第一讲 在改革中构建新闻传播教育科学体系 / 柳斌杰	018
第二讲 向世界说明一个快速发展又复杂多元的中国 / 周明伟	032
第三讲 传播学发展的三个新趋势与三个新问题 / 洪浚浩	046
第四讲 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 赵月枝	059
第五讲 本土研究的国际化：以《亚洲传播学报》为例 / 郝晓鸣	077
第六讲 移动媒体研究：开辟亚洲传播研究的新路径 / 魏然	092
第七讲 公共传播与新媒体赋权：空间、想象与救赎 / 师曾志	102
第八讲 媒介与流行文化研究前沿 / 冯应谦	117
第九讲 传播学经验研究的策略与理论建构 / 邱新有	127
第十讲 重塑公共外交 / 王坚	148
第十一讲 网众文化：重构媒体传播研究的新范式 / 何威	163

实践前沿

第十二讲 媒介融合是一场革命 / 喻国明	180
第十三讲 传媒的融合式变革、影响逻辑和竞争焦点 / 陆小华	198

第十四讲	大数据带来的时代转型 / 刘德寰	219
第十五讲	互联网时代的舆论引导 / 王惠	234
第十六讲	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培养跨文化国传人才 / 高岸明	259
第十七讲	世界是谁，中国是谁，我们是谁 / 胡锡进	280
第十八讲	加强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问题与对策 / 严文斌	292
第十九讲	重建新闻人的世界观 / 李鸿谷	306

学术前沿

第二十讲	城市精神的伦理和政治意义 / 贝淡宁	320
第二十一讲	构建我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 潘维	329
第二十二讲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宪法》 / 强世功	344
第二十三讲	国学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 王杰	368
第二十四讲	中国故事的传播之道 / 王义桅	384
第二十五讲	我们为什么唱响中国 / 玛雅	402

终篇

	全球传播的新视阈与中国对外传播的重新定向 / 史安斌	420
--	----------------------------------	-----

后记

开 篇

重思中国传播学¹

◎ 李 彬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宁夏大学、辽宁大学、西安政治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等。主要著作有：《传播学引论（第三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传播符号论》《大众传播学》（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欧洲传播思想史》（即出）、《新中国新闻论》《全球新闻传播史》（国家级精品教材）、《中国新闻社会史》（国家精品课程教材）、《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水木书谭：新闻与文化的交响》《清谭杂俎：新闻与社会的交响》等。

本学期一开学，研究生院让先报一个讲座题目。当时想来想去，总也找不到如意的，正好刚看了一篇文章，也是自己多年关注的话题，题为“重构中国传播学”。于是，一冲动，就将此题报上去了，后来有点后悔，因为，太大太新，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我的本意重于反思，题目改为“重思”或更恰当。通过重思中国传播学，想来也能同理地重思其他学科。由于能力所限，对这个题目，我只能当作一种尝试，一种初步的探索，但愿多少有助于大家拓展思路，激发一点求学问道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何谓传播学？按大道至简的理解或定义，传播学是探讨人类传播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不言而喻，人类一切活动都离不开传播，少不了传播，曾子“一日三省”，属于发生在自身的传播；“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是人与自然万物的对话；“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是人际间的交往。至于现代传播活动，更是触目皆是，举世滔滔，看看“低头一族”就可想而知了。

传播活动，古今皆然。而研究传播成为一门学问与学科，则是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全球拓展，导致人类信息空前涌流，促使社会交往空前活跃，形成《共产党宣言》论述的世界历史图景，用鲁迅的话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于是，针对信息、传播与交往的探讨，也就自

1 演讲时间：2015年10月29日。

然形成了。特别是“二战”前后电子媒介的迅猛发展，现代传播更如大江东来，汹涌澎湃，新闻报道、广播电视、竞选演讲、商业广告、战争宣传、危机公关等，日益广泛地影响人类世界与社会生活。为此，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尤其高度关注，纷纷展开研究，从而相互交叉，不断融汇，最终在美国形成一种专门的学科——传播学（communication）。

传播学及其兴起除了传播科技的直接作用，更值得关注的还在于现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背景。一个直接而明显的事实是，美国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主要问题与学术关切等，无不契合二战前后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演化脉络。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二战期间，美国就有一大批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投身宣传研究，许多成果为战后传播学在美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再如，“二战”后的“冷战”更是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传播学进程，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参与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就是“冷战”的产物。所谓四种理论，其实只是两种，也隐含着两大阵营的对峙，一种是“自由主义理论”，一种是“极权主义理论”。当然，传播学也不乏契合传播规律的科学内容，如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等传播学概念如今都融入人们的日常用语。

上面讲的多是美国的情况，难道传播学只是美国的学问吗？当然不是。除了国际学界占据主导与主流的美国传播学，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欧洲批判传播学也颇有声势。例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或文化领导权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文化反思；英国的文化研究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福柯的话语权力思想、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一批法国思想学说，以及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阐发等，这些学术理论无不对传播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对人类传播理论的贡献不在美国实用实证的研究之下。

不过，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又不能不说是一门美国的学问，或源于美国的学问。虽然一般不这么明说，也不这么理解，而是将美国传播学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科学。所谓“国际接轨”，无非就是按照美国的理论、方法、思路等研究传播，发表成果。比如，中国的新闻传播院系有个习见现象，研究生的论文开题与答辩往往会问：你的研究用了什么理论？而这里说的理论，实际上是美国某家某派的学说、观点等。假如你的研究没有以这样那样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为依据，那么无论选题多有价值，也无论思路多有新意，研究多有水平，都好像不入流，甚至不合格。相反，如果照猫画虎、移花接木地与所谓国际接轨，即便是用众所不知的语言讲众所周知的常识，也是一等的学问。这一状况与趋势，姑且称之为“趋美国化”。

中国全面引进与推进传播学或美国传播学研究，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距今已经 30 多年。尽管“冷战”正热的五六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已将《报刊的四种理论》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而 80 年代大规模展开的恰恰是施拉姆一路的“冷战”传播学，与此同时，欧洲传统的批判研究则门前冷落车马稀。其间，一个看似矛盾的情况是，美国传播学被视为客观普适的科学，而欧洲批判理论，如传播政治经济学，则由于同马克思主义道统关联密切被视为非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状况与趋势，就是常说的“去政治化”。“去政治化”有两类：一是，不讲政治，不问政治，不关心政治；二是，去掉一种政治，再讲一种政治，即所谓“去政治化的政治”。80 年代以降的思想文化气候，既可见日渐远离政治的趋势，蔓延至今遂有小清新、“小确幸”一路政治冷漠，又不乏种种“去政治化的政治”。而无论如何，结果是趋美国化与去政治化在此汇流，渐渐构成今日传播学的总体格局，中国如此，他国亦然。

我们需要重新反思的，就是这种总体格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日的中国与世界既不同于 30 年前，更迥异于 60 年前。天翻地覆慨而慷，人间正道是沧桑。一方面，当初适用自身需要的美国社会科学包括传播学，由于陷入自娱自乐的内卷化，越来越失去思想的活力与学术的敏锐，就像华人学者黄宗智批评的：“今日美国一般的社会学、政治学系，对学生们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谓‘理论’或模式，然后才做经验研究，这种认识方法的结果之一是模式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十分庸俗。”¹ 华人传播学者李金铨在 2014 年的一篇文章中的看法所见略同：

20 世纪 70 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读时，新闻系内部密集出现以下的“理论”：议程设置 (agenda setting)、知识鸿沟 (knowledge gap)、使用与满足 (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 (spiral of silence)、认知共同适应 (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 (third-person effect)、涵化 (cultivation)、框架和铺垫 (framing, priming)、创新扩散 (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这些“理论”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开始就有气无力，有的刚提出时颇有新意，但因为长期孤立使用，过劳而透支，很快呈现疲态。几十年后，我都快退休了，看过各种走马灯似的流行，抓住几个老题目不断再生产，固然资料累积很多，但见解增加几许？何况连这类“内部理论”也长久不见有人提出，而整个学科生态又满于划地自限，不作兴跨学科互动，其理论贫瘠的尴尬境况可想而知。坦白说，今天在美国有些大学博士课程，可以狭窄到从上述的“理

1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第 545 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论”选择一个题目，写一篇不痛不痒的论文，就可以拿到学位了。¹

另一方面，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样一种传播学在整体思路是否束缚了我们的学术想象力与创造力，对迅速发展、急剧变化的中国来说，其核心概念与基本理论是否足以有效地解释现实，更不用说有益地改变现实了。正如不止一位学者指出的，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中国传播学已经无法与当代中国及其传播实践展开生机勃勃的对话。那么，原因何在呢？除了美国传播学自身的生命力萎缩，解释力下降等，关键恐怕还在于这套学术话语的理论预设与核心关切即使不说与中国社会大相径庭，至少也是颇异其趣。如前所述，美国传播学源于二战前后自身的一系列社会历史语境，由于尊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美国梦等，更由于世界霸主的野心与地位，而形成一种特色鲜明的学术旨趣以及研究内容。如果说美国经济学的理论预设是利益最大化，政治学的核心关切是分权制衡，那么，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与学术关怀可否归结为实用主义的理念形塑呢？如政治传播的形象塑造、商业传播的品牌营销、文化传播的价值推广等，说到底都致力于实用哲学基础上对人的观念的影响与塑造，如同基督教传教追求的目标，极而言之就成为“洗脑”（brainwashing），美国人发明“洗脑”一词看来并非偶然。

既然如此，那么，假如超越这一理论预设与核心关怀，以开放的学术视野、鲜活的问题意识审视中国社会及其传播，是不是能够发现全新的、被遮蔽的核心问题呢？如果说经济学的中国血统是经世济民，政治学是小康大同，文艺学是气韵意境，那么，传播学的关键词可否归结为理想主义的世道人心呢？具体说来，自古及今，中国人的传播行为及其观念在个人层面讲求正心诚意，在社会层面讲求将心比心，在天下层面讲求心心相印，这一切无不关乎人心或世道人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陈曦如有部著作《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心传”一语颇为传神地触及中国传播的核心旨趣。人类历史上，恐怕没有比中国人更在乎人心了，仅看流传不息的民谚俗语就可略知一二：足寒伤心，民怨伤国；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从世道人心的视角入手，也许更能深切洞明地切入中国社会及其传播肌理，从而把握人间正道与传播正道。你看，飞将军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操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说到底无不在于正心诚意，他们的美名天下扬，并非源于刻意的传播，而是来自心悦诚服的倾心。自然的倾心与人为的洗脑，不说大相径庭，也是颇异其趣

1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载《书城》，2014（2）。

的。立足观念形塑的美国传播学面对难以形塑的对象如穆斯林时，充其量只能设身处地地“理解”所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的表达权利”，就像赵汀阳一针见血挑明的，无非是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而已。¹而立足世道人心的中国传播与传播学，则在“礼不往教”之际，更着眼于心有戚戚焉的“接纳”，由此形成一种由近及远和而不同的传播生态，如，心平气和、政通人和、天下大同——显然比观念形塑的传播与传播学包含远为丰富的人文社会历史蕴含。

反思中国传播学也好，重构中国传播学也罢，归根结底无不基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正如美国传播学无不基于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逻辑而繁衍生息。因此，我们只有真正了解中国，才能明白传播何为，学问所在。那么，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自己了解的是怎样的中国呢？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发展的中国？问题的中国？城市的中国？乡村的中国？内地的中国？边疆的中国？影像的中国？想象的中国？宝马香车、夜夜笙歌，还是热血、辛劳、眼泪、汗水的中国？诸如此类，纷繁错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清华国学院2014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演讲录，包括五位国学院导师的学术报告，总题为《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从各自专业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如果说《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着眼于历史中国与文化中国的解读，那么今年“中国好书奖”获奖图书《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则可谓对现实中国与政经中国的剖析，汇聚了15位具有战略思维的专家学者的访谈，如曹锦清、史天健、王绍光、张文木、金一南、林毅夫、胡鞍钢、潘维……这些剖析解读虽然各抱地势，取舍万殊，但都有一个大写的中国，借用许纪霖的话说：“什么是现代中国，这一被认为是过于宏观和空疏的大问题，需要再次提出来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任何一个微观的研究，都要借助某种宏观的知识背景，即使不研究宏观问题，也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于某一个或几个理论预设或者框架背景；而任何一个微观领域的研究，其真正的意义也只能放在宏观的知识背景里面才能获得理解。”²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内涵丰富的国家。怎么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把握中国，人们往往也像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对此，毛泽东的一篇经典文章《论十大关系》，提供了一种哲学认识论的思路与方法。也就是说，认识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离不开十个相反相成的关系或相辅相成的矛盾，中国特别是现代中国从哪

1 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91～1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许纪霖、刘擎主编：《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阐释》，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里来，往哪里去，就取决于这十大关系或矛盾，原文的表述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虽然十大关系及其表述如今不见得一一适用，正如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具体提法如今不见得一一恰切，但十大关系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却依然是理解现代中国的“要领”。按照十大关系的思路与方法，重思中国传播学有四组关系尤为突出，构成不可或缺的思想维度：一是，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二是，内地与边疆的关系；三是，古代与现代的关系；四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习近平主席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到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重思中国传播学也有四个命运攸关的思想维度，四维不张，学乃灭亡。

先看城市与乡村的关系。

在世界几大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的乡土色彩最为鲜明，先秦的耕战、千百年来的耕读传家与游牧经济、现代费孝通提出的“乡土中国”等，都可谓这一中华文明的突出表征。即使汉唐盛世、宋、元、明、清出现了当时世界上罕见的国际大都市，长安、洛阳、汴梁、临安、金陵、北京等，也同样与乡土中国水乳交融，城乡始终存在一种有机互补的结构，就像《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以及“三言二拍”等明清小说中的生活图景。“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宋人张俞这首《蚕妇》，是孩童都熟悉的作品。且不论作品主题，仅看进城出城，家常便饭，就反映了一种自如的城乡关系。随着近代列强入侵，出现了一批半殖民地的条约口岸城市，打破了传统中国的城乡格局，一种新的城市文明不仅带来现代的一整套生活方式，而且由于这种新型城市更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相关联，即《共产党宣言》所言，“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从而同乡土中国的农耕游牧传统渐行渐远，中华文明由此遭遇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如“乡巴佬”等流行语，就是这一新型城乡关系习焉不察的例子。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与当下“新三农”问题——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也无不源于这一城乡结构引发的千年变局与百年动荡。从现代文学中，更可以直观地感受这一巨变：鲁迅的《故乡》、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边城》、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刘亮程的《凿空》……北京大学青年学者贺桂梅在一篇近作中，论述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时更是尖锐指出：

21世纪中国的最大变化在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国家”。这个剧烈的城市化过程，是以乡村社会的停滞、破坏乃至崩解为前提的，因此世纪之交提出的“三农”问题才格外严峻。在新的城乡关系结构中，如何修复乡村社会并在传统社区基础上重建“公共性”，成为重要议题（黄平、温铁军等）。¹

对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如今上上下下越来越意识到其民族存亡、文明永续的意义。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到“十八大”以来着力推进的美丽中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从习近平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他强调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都表明一种日渐明确的忧患意识，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历史性、宿命性地取决于城市与乡村的有机关联。2015年中央政治局第22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城乡关系。习近平主持学习时说：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此相应，近年来，一批传播研究成果，也在城市与乡村的维度上纷纷展开，有些博士论文作出颇富新意的探讨。不过，传播学总体上还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思想逻辑，这套逻辑在80年代末的电视政论片《河殇》里得到集中展现，虽然片中用了不少诗意化的煽情句子，呼唤国人告别黄皮肤、黄土地、黄河文明，拥抱蔚蓝色的海洋文明，而核心意思无非一句话——全盘西化。与此同时，广大山乡也被当作愚昧、落后、封建、保守的东西遭到排斥和放逐。告别乡村，走向城市；告别中国，走向世界（西方），成为现代性的集体无意识。受制于这套逻辑的中国传播学，正如赵月枝教授在《重构中国传播学》一文中的批评，不仅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而且也是城市中心主义的。2015年“两会”期间有部环保纪录片，一度引起网民热议，这部涉及雾霾的作品为赵月枝教授的判断提供了传播实践领域的一个最新佐证。破土网上有篇文章分析得不无道理：

雾霾的危害并不仅仅面向中产阶级，但它却是中产阶级最为关切的污染。城市对空间的特有配置，让城市居民与土壤和河流隔离开来，因此土壤和水污染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具有切身的意义。只有城市上空的大气，无视城市对空间的安排，同样笼罩在所有阶层的头顶。因此，大气污染是中产阶级最为可见的污染，他们比所有人都更需要蓝天。然而，对于身处农村空间中的穷人而言，土壤和水就是直接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相比于蓝天，干净的土壤和水对他们更有用处，因此，他们也是

1 贺桂梅：《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载《中华读书报》，2015-04-29。